
主编 于晓红 副主编 乔利平

民族·文化·哲学

MINZU WENHUA ZHAXIE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民族·文化·哲学

主 编 于晓红

副主编 乔利平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7 印张 157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40 元
ISBN 7-5434-2930-6/B·16

前 言

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发生剧变的转型社会。生活在转型社会的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周围在振荡，其中最触及人们灵魂、感受最强烈的、有时甚至令人感到痛苦的莫过于文化的转型和传统观念的反思。这也是中国当前兴起的文化问题研讨热潮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文化研讨热潮中，人们遇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在现代中西文化碰撞中，孰优孰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更深刻源头何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回答上述问题绝不是我们这一本小书所能胜任的，但如果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我们这本小书，获得一点启示，对于回答上述问题有所帮助，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过三次中西文化的大碰撞。第一次是17世纪的明末清初，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带来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和思想观念，给中国长期封闭的、大一统的文化注入了一股清泉，一度引起朝廷、国民的文化动荡；第二次是本世纪初的“五·四”文化运动，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文化的传播，促使了封建王朝的灭亡，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

推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第三次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我国在经济、科学技术方面的全方位开放，中西文化也得到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及思维方式的碰撞已成为摆在每一个中国百姓面前的现实问题。长期以来，对待中西文化的冲突，我们总是陷在要么“全盘西化”，要么“保存国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中西分途，中西对立，没有深入辨识中西文化发展轨迹中的异同和优劣，没有认真去探寻中西文化的互补问题，因此也就始终没能准确而切实地把握住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本书试图运用深入浅出的方法，通过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典型分析，对中西文化的异同进行对比和哲学思考，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价值、作用。我们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既不是要全盘肯定或否定中国文化，也不是全盘肯定或否定西方文化，而是通过研究对比和深层次的思考，去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发掘出其内在价值，通过说明中西文化交流之必要，中西文化互补之重要，中西文化促进之必然，从而为我国现代化改革提供服务。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曾对本国、本民族的历史进步及世界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我们没有理由随意地褒贬任何一方。世界上没有一个抛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能生存和发展的民族或国家。今天发生在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运动，不是要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也不是对中国文化的考古发掘，而是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扬长避短。在这一过程中吸取借鉴西方文化的有益的方

面也是十分必要的。中西文化的交融是世界文明发展之必然。

本书主编于晓红、副主编乔利平。

全书共分七个部分，分别由韩幼怡、宋丽卿、乔利平、忻梅、于晓红、胡俊撰写。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曾得到河北大学哲学系七八级中许多同学的大力帮助。

对于那些关心、协助本书编辑、出版的同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书中如有不妥之处，欢迎读者争鸣、批评、指正。

编 者

1997 年元月

目 录

一、修身养性	(1)
1. 修身与治国	(1)
2. “仁义”的社会群体观	(4)
3. “人情磁力场”析	(8)
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2)
5. 内求——自我修养的方法	(14)
6. 从“不敢为天下先”谈起	(18)
7. 中庸之道与适度原则	(21)
8. “不畏人知畏已知”	(24)
9. 漫话嫉妒	(27)
10. “孝”——人之大伦	(30)
11. 析“无商不奸”	(33)
12. “忍字头上一把刀”	(37)
13. 性善、性恶的对话	(40)
14. 面子·名分·气节	(43)
15. 科技与道德的冲突	(45)
二、治国之术	(49)

1. 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	(49)
2. 中国的民本与民主	(53)
3. 闭关锁国与对外开放	(57)
4. 人治与法治	(61)
三、世俗宗教	(65)
1. “天人合一”的宗教观	(65)
2. 此岸的“神灵世界”	(68)
3. “罪感文化”与“乐感文化”	(72)
4. 不覬觐最高权力之座	(75)
5. 兼容·并蓄·同化	(79)
6. 宗教的两极性：科学？迷信！	(83)
7. 儒释道三教纷争与合流	(86)
8. “上帝死了？！”	(90)
四、体认思维	(95)
1. “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思维	(95)
2. “取象比类”——象数思维	(99)
3. “相反者相成”——矛盾思维	(104)
4. “穷理尽性，以致于命”——义理思维	(107)
5. 经验体认——直觉思维	(110)
6. 反省内求——“悟”的方法	(114)
7. 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整体思维	(117)
8. “浑沦天地间，和之至矣”——和谐思维	(122)
五、婚姻家庭	(129)
1. 太阳与月亮之争	(129)
2. 父母、媒妁之言不可违吗？	(133)
3. 休书·节妇·协议离婚	(136)
4. 漫话择偶标准的变迁	(140)
5. 忠贞不渝与婚外恋	(144)

6. 反目为仇——毁容案的思考	(147)
7. 人约黄昏后	(151)
8. 转型社会中的婚姻关系	(154)
六、治学之道	(159)
1. 学而优则仕	(159)
2. 望子成龙	(163)
3. 教育的呼唤	(167)
七、生活方式	(171)
1. 安魂之曲可安魂?	(171)
2. 崇老敬老的文化	(175)
3. 奏响生命的最后华彩	(179)
4. 地球母亲的呼唤：别挤了!	(183)
5. 太极拳与跑步	(187)
6. “寻根”与“流星”	(191)
7. 君子何必不言利	(194)
8. 储蓄与借贷	(198)
9. 人种的优选工程——优生优育	(201)
10. 随缘——一种处世的艺术	(205)
11. 和为贵——中国传统人际交往的准则	(208)
12. 重实用的入世哲学	(211)

修身养性

1. 修身与治国

凡有志做大事的中国人，都把个人品行的修养与为国效力联系在一起。古有孔子倡导的修身齐家的理论，近代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现有 80 年代大学生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响亮口号。这些思想、口号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为本的思想。

中国传统的道德修养是以个体道德为起点的。众所周知，“四书”是儒家的经典，而儒家学说又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干。在“四书”之一的《大学》中有这样的话：“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又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表明古人把个人道德修养提高到政治之本的地位。齐家、治国、平

天下虽然重要，但对修身来说只是末，因为只有修身解决好了，家才能齐，国才能治，天下才能平。孔子说：“苟正其身，于从政所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可见，修身为本是儒家的一贯思想，儒家始终是以修身为出发点的。

儒家在论证“修身为本”的思想时，是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对待的。相比之下，修身是对个人而言，依次发展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的重要，在于它是治人、治国的前提。修身本为治己，治人治国都以治己为先决条件，这是有深刻道理的。因为人是社会主体，家庭、国家、天下大事都是由具体人去做的，人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家庭、国家、天下大事做得好坏。《大学》特别强调的是统治者自身的榜样力量及影响。自身是什么样子，他治下之民和所治之国必然也是什么样子。治人者能够修身，自己的思想行为合乎道德伦理原则，就会影响整个社会；治人者自己思想行为不轨，违背道德伦理原则，同样也会影响整个社会与治下之民的。因此，儒家认为任何好的制度和主张，都是靠人去落实的。有能够执行文武之政的人，文武之政方能变为现实，反之好的社会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定条件下，明君治国、昏君丧邦的事例屡见不鲜。但是把一国的兴亡系于君主一人之身，系于君主的伦理道理品质上，无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儒家单纯讲修身为本的思想也是片面的。任何社会的人的成长及国家的发展不是纯自然的过程，个人道德修养、素质的提高，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的影响和制约。民主、法制也是治国平天下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只要社会还存在不平等、不合理的经济因素，法制的建立健全就会长期地存在下去。但是，我们从马克思为人类设计的美好蓝图中看到，未来社会的建立是以人的自由自觉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仍以

整个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素质高低为条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的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重要问题。

归纳中外历史上关于治国的理论，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治国的德治思想，一类是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法治理论。比较这两种理论，法治思想强调以法治国，靠健全法律制度安邦治国，依法办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确实具有极大的合理性。特别是在社会存在着各阶级的利害冲突时，只有依靠严厉的法制，才能维持社会的统治，保证社会的正常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哪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最健全、贯彻的最为彻底，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较快，文明程度就较高。但是法制不是社会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而当人们素质提高，道德完善，人人成为自由自觉的人时，法制也会改变现在的模样，最终以德治的面貌出现。然而，在历史上德治的思想却没有法制理论那么辉煌的功绩和崇高的地位。尽管我们认为德治是更为根本的治国前提，但是在人类经济利益的激烈冲突和政治力量的残酷较量中，德治是那么苍白无力，常常遭到历史的嘲笑，因此，往往被世人束之高阁。然而在社会的发展中，人们又重新看到了德治的作用。西方国家中存在的“道德危机”，说明了法制不是万能的，法制也不是最终的和唯一的治国安邦的手段。人们呼唤道德，呼唤人的情感，表明了法治、德治应是内在统一、相互补充的，如果说法制是现行社会治理中行之有效的最主要手段和途径的话，那么德治则是长久的、根本的方法和手段。

儒家不仅提出了修身的主张，同时也论述了修身的途径。《大学》中提出：修身在“正其心”和“诚其意”。正心就是专心，诚意就是不自欺。换句话说，就是要专心诚意地致力于政治伦理道德的修养和实施，嘴上说的不算，行为体现的才算数。

而且要在没有别人监督的情况下，自己也能依照道德伦理规范行事，即“慎其独”，这是修身达到的最高境界。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儒家修身为本的思想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首先，它强调要重视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无疑是正确的。其次，它强调只有修身解决好了，家才能齐，国才能治，天下才能平。“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在今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修身为本的思想也强调了统治者自身的榜样力量及其影响，注重“上行下效”，这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有着重要的启示。

当然，儒家修身为本的思想也包含着糟粕的成份，如它过分强调了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作用，而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者均服从于封建宗法社会的伦理纲常、道德准则等，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儒家把修身与治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想。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切不可一心向钱看，忽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忘记自己对社会、国家的责任。因此，我们确有必要重提“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这也算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给我们的宝贵启示吧！

2. “仁义”的社会群体观

最近有关人员就纪念我国甲午战争 100 周年为主题内容，向部分市民做了一次口头调查。当问到“你知道不知道甲午战争”时，令人吃惊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知何为甲午战争，或者对此做了错误的回答。有个群众甚至直接了当地说，这些事是国家领导们关心的事，我们只知道赚钱。可见关心国家大事、爱国主义的观念已在现在一些青年人心目中淡化了。在我国经济体制由旧向新的转轨过程中，许多人钻空子，打擦边球，

千方百计为个人谋利，甚至不惜把国家、集体的财富装进自己的腰包，以致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国家、集体的利益受损几万、几十万甚至更多，不心疼，无动于衷，而个人的钱包少一分收入也不干，也要千方百计讨回来。“一心为公”的集体主义观念快要被人们忘记了。在我们的一些城市、乡村里，一个时期当坏人做恶、抢劫钱财、伤害人身时，不是也出现了无人敢管、无人过问、明哲保身的情况吗？人们的“仁爱之心”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而爱国、爱集体、爱人的道德观念正是我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美德。难怪，有些忧国忧民之士哀叹：“物质文明上去了，道德文明沦丧了”。究竟怎样看待我们传统的道德风尚，怎样分析当前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呢？让我们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中去看一看吧。

中国历来是一个群体观念很强的民族，从众心理根深蒂固。在古代，一个人从出生那天起，便被固定在封建伦理之网的某个点上。他所能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都是伦理关系；他所学习的知识，也大都是有关封建伦理的知识；他的行为，也逃不脱君臣、父子、尊卑等伦理范畴。这样的生活空间，决定了他的个性特征。生活在这种空间的每个人又通过血缘、宗室、民族等各种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个群体。群体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往往也就是个体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人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无论如何是摆脱不了这个“生活空间”和“群”的影响及制约的，由此就形成了中国式的以伦理关系为纽带的群体观或集体观。这种群体观或集体观，又是以“仁”为核心、居统治地位的。

“仁”字早在春秋以前就出现了，意为孝顺双亲。孔子则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在丰富发展“仁”的理论时，特别强调了人的群体价值。孟

子就说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在儒学中，总是从人际关系着眼，去界定人的好坏、是非，把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品质作为衡量人的标准，这些标准都是从人的群体价值出发的。荀子说得更明确：“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从群体角度去认识人，必然用群体价值观来衡量人。至于孔孟学说中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更是以群体利益为重的生命价值观。

以儒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群体的和谐是其宗旨。它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通过道德修养提高思想境界，融个体于群体之中，个体的欲望与价值以群体的欲望、价值为转移。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崇尚人类的群体价值的，强调个人必须严格服从集体，更多重视人的义务和责任的。正是在这种仁义群体观的道德熏陶下，中国历史上涌现了无数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和杰出人物。古代有爱国志士屈原投江以报国；宋代有岳飞拼死疆场的“精忠报国”；现代更有邱少云为了集体的胜利，不惜让大火烧焦了自己的身躯的感人事迹；而雷锋的那句“甘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名言更是深入人心，教育了全国人民。

这里我们也毋庸讳言，传统的仁义群体观也具有其片面性、局限性的一面。那就是它过分地强调了集体的利益，忽视和压抑了个人权利，限制了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就是这种负作用的集中表现。它要全体人民走一种步，唱一个调，按一种模式生活。久而久之，就使中国人染上了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痼疾，束缚了中国人前进的步

伐。这种用集体主义湮灭人的个性的观念是错误的。真正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仁义的道德观念，必须是建立在尊重个性、尊重人的独创性的基础上的。

与传统文化过份强调群体性相对照的是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道德观。西方文化历来重视人的个性、权利和地位。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强调的道德行为的基础在于人们的自由意志的思想，到近代西方哲学中的“天赋人权”、“个性保护主义”的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反映着这种个人主义的倾向。从历史上看，个人主义和（合理）的利己主义思潮曾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天赋人权”曾是摧垮中世纪封建神学统治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个人主义的启蒙，使社会更加尊重个人的权利、尊严，曾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在伦理方面也影响了西方人性格上的独立化、个性化的发展。但是，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人生观，置个人利益于他人或整体利益之上，就必然要导致个人与整体的对立。个性过分扩张，利己走向极端，势必会影响社会体系的和谐，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对立。正因如此，当西方文明步入 20 世纪末时，人们普遍出现了困惑，于是便到东方文明中去寻找解脱困惑的灵丹妙药。在这里他们发现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早已有了他们所缺乏的重视群体利益和价值的可贵思想。

的确，把个人和群体结为一体的观念，使人注重道德价值，注重整体利益，增进了人们之间的友爱与协调，造就了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重的高尚情操。正是这种重群体的心理，强化了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了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思想得以生根。

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当我们强调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独创性时，切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应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弘扬

中华民族注重群体价值的优秀品质，增强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为祖国的振兴而尽心竭力。

3. “人情磁力场”析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信条。人情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力场一样，维系和制约着中国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在改革开放、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时，“夫妻店”、“家族企业”也纷纷出现。“儿子开车老子坐，妻子管帐、女儿进货，大舅小姨一起工作”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各大中城市中，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搞活，在原有“老乡会”的基础上，“同学会”、“兵团帮”、“老插”（插队知青）、“老转”（转业军人）的活动也日见频繁。这一切都缘于当今铁饭碗靠不住了，捞钱的渠道多了，工作生活中的风险大了，日后若遇什么困难，求得各路关系、各方面人情的相帮。正像成中英先生总结说，中国人遇事多半先靠人情，其次是说理，再次才是打官司。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现象——人情磁力场。

中国文化中对人的设计是：必须用“二人”去定义“一人”（“仁者，人也”），一旦越出了由众多的“二人”之“心”的交叉网组成的人情磁力场，“个体”就很难对自己下定义了，因此，中国人“二人”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人情”。

说到人情，我们有必要从“仁”字谈起。中国人讲的“仁”指的是这样一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心意感通，亦即是以心换心，并且，在这种双方心意感通的过程中，理想的行径必须是处处以对方为重。中国人的“礼让”，其实正是这种关系的外在表现。这种对人的设计，使中国人普遍地富于“人情味”，

即在面对相识的人时，不轻易拒绝别人的要求，急人之难，忘我地为别人办事，以及自己多吃一点亏也无所谓的作风。此外，一旦人际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就有趋于持久稳定的倾向。例如，不忘故旧，维持终身的朋友关系与婚姻关系等等。一些华裔学者认为，此种情况在大陆比台湾浓厚，在台湾又比香港浓厚。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笔者以为应从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立足点上来分析问题。

首先，中华民族素以“文明之邦”著称，作为人情磁力场外在表现的“礼让”风范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

“礼”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孔子所说的“礼”，主要是指作为西周政治法律制度的“周礼”，但又不完全是周礼。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使自己的言行举止按“礼”的规范去做，才可以达到“仁”的道德境界，也才算是一个具有“仁德”的人。可见，礼是“克己”的准则、尺度，“克己”是实现“仁”的途径，“仁”是以“礼”去“克己”而达到目的的。这其中当然包含着孔子“仁”字的保守方面，依“礼”去“爱人”，即按亲疏贵贱的差别爱人，对此我们可以弃之不用。

抛开古人思想中的封建糟粕，笔者认为儒家“仁义”、“礼让”的思想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文明礼貌活动，也是让人们之间以礼相待，彼此谦让，以便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而且，这种文明礼貌决不是表面上的事情，只有加强了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才能表现出道德行为，否则就会为一点小事斤斤计较，恶语伤人。所以，“礼让”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是很难的，关键是内心要有道德信念。试想，如果没有一颗“仁爱”之心，哪会有爱的行动呢？因此，我们今天仍有必要提倡“礼让”的风范。